

我和周总理顶过两次“牛”

杨易辰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了。尽管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但是周总理一生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的伟人风范却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我的心目中,周总理德高望重,是最可敬、可亲、可近的人,是中华民族杰出代表,共产党人的楷模。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一切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春蚕不死,吐丝不尽,我要像春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人民”。因此,周总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崇高的威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周总理生前,我曾经多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在十年动乱中,周总理还多次直接关怀、过问我的情况。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和他同我谈话的情景,时常萦绕心头,历历如昨,犹在眼前。想起周总理的亲切教导和深情关怀,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谨献上这篇短文,以寄托我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缅怀之情。

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援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2亿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转弯。因此,就同周总理争了起来,表示对再调拨2亿斤粮食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周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周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还有一次,那是关于大豆贸易问题。黑龙江是国家大豆主要产地,省里每年用大豆与苏联进行边境贸易,为省财政创收一些外汇,这对黑龙江的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国家更需要创汇以支持经济发展。中央要求黑龙江增加调拨给国家的大豆数量,用以增加出口创汇,这自然就影响了黑龙江的外贸收入。在这件事上,我又和周总理顶过一次“牛”,但在周总理的教育下,我还是服从了大局,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像这种情况还有几次,周总理都是十分耐心地晓之以理,最后我都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前,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要渡过难关,全面深化改革,我想,当年周总理要求干部要顾全大局的教导,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特别强调提出了要维护党中央、国务院权威。这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周总理当年就十分重视,并经常教育我们要全局观念,要支持中央的工作,维护中央的权威。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始终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都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法宝,这个政治优势和法宝是千万不能丢掉的。

二

周总理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这是周总理的一大美德。在我同周总理的接触中,也有深切的感受。记得就是1962年在辽宁开会时,周总理开始住在辽宁宾馆的三楼,欧阳钦同志住在他的楼下。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辛苦和紧张,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谈话,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欧阳钦住在楼下后,几次提出自己,要换一个地方住。大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周



总理解释说,欧阳钦是老同志,又患有神经衰弱症,大家到我这里来进进出出谈事情,会影响他的休息。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于细微处见精神,周总理这种关心和爱护干部,时时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德,使我们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在那种人妖颠倒、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保护一名干部是多么不容易啊!直至今日,许多老同志谈起这些,常常是潸然泪下,激动不已。我当时不在中央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地方干部,也同样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正是周总理对我的深情关怀,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激励着我从逆境中奋起,也对我此后的思想、工作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这些,我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黑龙江省遭受严重破坏,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奋战多年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关押。我也遭到严重迫害,三进三出,几经反复。在这期间,周总理对解决我的问题多次作过指示,支持我出来工作。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我肯定会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

1966年9月,奉行极左路线的当时黑龙江省委领导人,为了达到撒权的目的,制造事端,分裂省委,迫害同他持不同意见的其他省委领导同志。我被扣上“挑动工人斗学生”,“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压下去”等罪名,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在遭毒打、戴高帽、游斗12天后,一个造反派头头宣布我被解放了。我开始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了解到我的处境,保护了我。周总理在一次有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三派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上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来抓生产。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对周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10月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打通思想的会,要求各省来两名领导干部参加,一名是支持“文革”的,一名是对“文革”不理解的。我自然是最不理解的,也是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中最不理解的。周总理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心头热乎乎的,大家也进一步感受到周总理当年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就更加认识到了从事文史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周总理的关心下于1983年9月如期召开。这次会议排列为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周总理当时非常关心和重视这个会议。他的秘书赵炜说:大姐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戴着老花镜,坚持在自己办公室仔细阅读有关文件和会议简报。大会开幕后,她对全体人员作了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

在她的讲话中,不仅完全同意会议提出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方针,还以“动”和“静”的辩证关系高度评价了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周总理同志说,政协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政协的性质,要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作决定。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另一方面是静态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它需要动脑筋,看东西、思考、研究。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若从效果上看,这又可以发展为活动性的工作,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

育作用。这两方面的工作,看来是一“静”一“动”,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代表听了邓颖超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心头热乎乎的,大家也进一步感受到周总理当年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就更加认识到了从事文史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1986年,邓颖超同志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在革命斗争年代特别是长征路上的艰苦拖累,身体已逐渐不好。可是她仍未忘掉全国的文史工作。在她的直接关心批准下,这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当时邓颖超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不能亲临会场,但仍向大会发了贺信。她在贺信里说,社会需要你们,你们也要需要社会。你们要在工作多交朋友,尤其是多交新朋友,同国内各界人士一道,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当邓颖超的这封贺信在大会上宣读时,会场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一年多以后1988年,邓颖超同志因病向中央打报告,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在她一届主席任期内开了两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印证了她老人家对文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提笔挥毫 为《张治中回忆录》作序

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张治中将军从大革命时期就和我党,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是国民党军界唯一没有带兵和共产党军队打过仗的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曾“三到延安”,被世人称作“和平将军”。他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又一直和我党有着密切联系。在他最后一次代表国民党残余政府与中共在北平谈判后,因为国民党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他被周恩来诚恳地邀了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建设,1969年因病辞世于北京。

秦九凤

张治中将军的传奇经历,丰富的阅历和追求真理的一生是独一无二的。他生前就留下了一部自述——《张治中回忆录》。他逝世时,因为“文革”尚未结束,有关他的回忆录无法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各个领域内拨乱反正。当邓颖超得知白先生(张治中字)生前留有这样一本回忆录后,便指示由全国政协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邓颖超同志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还十分关心这部回忆录的出版。1983年她抽空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她在其中写道,“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张治中回忆录》这部61万字巨著的出版,重现了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风云人物,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首印就超过8万册。2010年又由华文出版社再版。

找金冲及谈话:写周恩来要实事求是

据著名党史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

机,我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造反派就把我第二次关进“牛棚”。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形势和我的问题一直十分关注。1971年5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黑龙江省的问题,周总理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那位领导人的错误做法,总理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杨易辰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是你把他甩开了,群众能服吗?杨易辰这个人比较爽快,有什么想法就公开讲出来,不背后搞鬼,争论起问题来,在我面前也敢吵,但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坚决照办的,这种干部你不喜欢,你就喜欢说你好话的人。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这次会议后不久,我第二次被“解放”,结束了“劳动改造”。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出来工作。不久,有人要我在一份犯了“走资派”错误的结论上签字,并且表示如果签字,马上就可以进省委领导班子做原来的工作,如果不签字就再回去接受改造。对此,我十分愤慨,坚决拒绝签字。我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工作了十几年,缺点错误肯定是有,但是说我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我不能不承认,不能接受,我不能为了一个官职而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特别是周总理如此关怀我,信任我,保护我出来工作,我更应立即行得正,决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和重托。由于我坚持拒不签字,很快被发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直到1976年,我才第三次被“解放”。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和家人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整天守着电视机,想多看一眼周总理的遗容,且每看必哭。在家里挂上了周总理的遗像,全家人一起动手,精心做了一个小花圈,摆在遗像前。全家人都换上素装,两岁的外孙女没有素装,老伴临时找来块蓝布赶做了一件给她穿上。28岁的儿子原定在1月份结婚,也因为总理逝世推迟了半年婚期。当时,“四人帮”一伙不让追悼总理,不许戴白花、黑纱。在总理追悼会那天,省委常委都集中到常委会议室,我和仲夷同志提议,每个人都应戴上白花,并给总理的遗像披上黑纱。但是,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决反对这样做。人心十分沉痛,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失声痛哭。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对周总理的感情是任何人也禁锢不了的。在北京,十里长街洒泪倾盆雨,纪念碑前白花成海洋。当时,哈尔滨市最繁华的第七百货商店门前也出现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总理遗像,遗像前摆着一个小白花圈,成为轰动一时的“小白花事件”。在追查这件事时,尽管搞这件事的人所在单位派性严重,情况比较复杂,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一个人说出去,可见人心所向。正是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品德,把当时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共同抗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家中,我和家人把白花缝在内衣上,黑纱带在内衣袖上。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全家只能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寄托对周总理不尽的哀思。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了,但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周总理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永存人心。这些年来,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一直在激励我奋发工作,不敢懈怠。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工作第一线,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余生和余热。



邓颖超在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讲话

邓颖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比较突出的贡献就有:妇女解放运动,党的作风建设,统战工作,对台工作,机要工作等等。然而她生前还十分关心文史工作,至今鲜为人知。

任一届政协主席 开两次文史会议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国家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在六届政协第一次全会上闭幕后召开的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邓颖超同志就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她要求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在三个月内对建国以来的文史工作作一次总结,然后提交第二次常委会议讨论。

全国政协文史委和文史工作办公室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家一致感到邓颖超同志和周总理一样,对文史工作都很重视并有一种特殊的关怀之情。

邓颖超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前,已经历了五

邓颖超关怀文史工作二三事

届政协,一共20多年。在这20多年内只开过三次全国性的文史工作会议。加之十年“文革”,政协已基本停止工作,文史工作更是无人问津。因此,全国性的文史工作会议准备工作会议就比较艰难。经过全国文史委工作人员的紧张准备,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在

1983年9月如期召开。这次会议排列为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周总理当时非常关心和重视这个会议。他的秘书赵炜说:大姐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戴着老花镜,坚持在自己办公室仔细阅读有关文件和会议简报。大会开幕后,她对全体人员作了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

在她的讲话中,不仅完全同意会议提出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方针,还以“动”和“静”的辩证关系高度评价了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周总理同志说,政协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政协的性质,要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作决定。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另一方面是静态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它需要动脑筋,看东西、思考、研究。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若从效果上看,这又可以发展为活动性的工作,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

育作用。这两方面的工作,看来是一“静”一“动”,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代表听了邓颖超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心头热乎乎的,大家也进一步感受到周总理当年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就更加认识到了从事文史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1986年,邓颖超同志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在革命斗争年代特别是长征路上的艰苦拖累,身体已逐渐不好。可是她仍未忘掉全国的文史工作。在她的直接关心批准下,这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当时邓颖超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不能亲临会场,但仍向大会发了贺信。她在贺信里说,社会需要你们,你们也要需要社会。你们要在工作多交朋友,尤其是多交新朋友,同国内各界人士一道,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当邓颖超的这封贺信在大会上宣读时,会场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一年多以后1988年,邓颖超同志因病向中央打报告,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在她一届主席任期内开了两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印证了她老人家对文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张治中将军从大革命时期就和我党,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是国民党军界唯一没有带兵和共产党军队打过仗的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曾“三到延安”,被世人称作“和平将军”。他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又一直和我党有着密切联系。在他最后一次代表国民党残余政府与中共在北平谈判后,因为国民党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他被周恩来诚恳地邀了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建设,1969年因病辞世于北京。

张治中将军的传奇经历,丰富的阅历和追求真理的一生是独一无二的。他生前就留下了一部自述——《张治中回忆录》。他逝世时,因为“文革”尚未结束,有关他的回忆录无法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各个领域内拨乱反正。当邓颖超得知白先生(张治中字)生前留有这样一本回忆录后,便指示由全国政协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邓颖超同志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还十分关心这部回忆录的出版。1983年她抽空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她在其中写道,“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张治中回忆录》这部61万字巨著的出版,重现了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风云人物,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首印就超过8万册。2010年又由华文出版社再版。

找金冲及谈话:写周恩来要实事求是

据著名党史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

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志回忆,1988年3月是周恩来的90诞辰。邓颖超同志在阅读了《周恩来传(1898~1949)》后,于12月5日给中央文献室的主任李瑞同志和金冲及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低,应当实事求是。”

这部书于1989年2月出版后,邓颖超又于当年4月5日给金冲及同志叫到西花厅,对金冲及说:“我已经听了(当时邓颖超同志年事已高,眼睛看书比较吃力,一般由护士许奉生或服务员霍英华读给她听)从‘南开学校’到‘在中共中央工作’这几节。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这部书是一种创新,文风上也是一种创新。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她听了沙基惨案中没有写周恩来遇险情况时,很直率地提了意见,说:当时上街游行时,是三个人一排,帝国主义分子的机枪扫射过来后,恩来两旁的人中弹身亡,他侥幸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当时是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的。希望你们再版时能够补上。

当她听了1928年她和周恩来联袂去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途中在大连遇险的情况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时,便很认真地要求写完整些、准确些,并亲自写了回忆录《一次遇险和脱险的经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也使得《周恩来传》更加完整。

邓颖超始终要求文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既对历史负责,也对后代负责。这就是邓颖超同志对我们每一个文史工作者的一贯要求。